

塑造人物形象,需要沉潜到生活深处

程 旸

童庆炳先生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指出:“着重刻画人物形象是小说走向成熟的标志。”在现实主义文学看来,典型人物是小说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典型人物‘灵魂的深度’,不仅表现在符合历史真实的尺度上,而且还表现在从典型人物灵魂里所折射出的作家人格的真诚里”。更重要的是,典型人物与特定时代环境有唇齿相依的关系,“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的关系还有相互依存的一面,失去一方,另一方也就不复存在”。所以,“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命题,是一个整体性命题”。放在新时期文学的视野里,这些观点构成反思性的回旋。

成功塑造了一个好的人物形象,是对作家很高的评价

新时期初期,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塑造的人物形象,曾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如王蒙《夜的眼》里的陈果、张贤亮《绿化树》里的章永璘、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里的女记者、王安忆《本次列车终点》里的陈信等。当然,最打动人心的还是路遥笔下的高加林,以及后来他在《平凡的世界》里成功塑造的孙少平、孙少安等形象。1985年文学转折之后,人物形象在小说中的地位一路走低,然而莫言《红高粱》里塑造的“我爷爷”“我奶奶”的形象,依然光彩照人。1985年文学转折,对应着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历史潮流,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逐步退场,20世纪西方现代派小说成为新宠,它对当代小说的转型发生了深刻影响。受《麦田里的守望者》《在路上》等小说放弃人物塑造观念的荒诞与变形,“人物几乎没有历史和过去”,甚至于“每一个人物都是主人公而没有一个人物是主角”。这种倾向向描写人物的荒诞与变形,“人物几乎没有历史和过去”,甚至于“每一个人物都是主人公而没有一个人物是主角”。这种倾向向描写人物的荒诞与变形,“人物几乎没有历史和过去”,甚至于“每一个人物都是主人公而没有一个人物是主角”。这种倾向向描写人物的荒诞与变形,“人物几乎没有历史和过去”,甚至于“每一个人物都是主人公而没有一个人物是主角”。



路遥在《平凡的世界》里成功塑造了孙少平、孙少安等形象。图为电视剧《平凡的世界》剧照。

充盈着日常生活的烟火气息——读长篇小说《世纪母亲》

李掖平

张军家的长篇小说《世纪母亲》(作家出版社2021年3月出版)虽然写的是“母亲”,但他定格还原的是中华民族所有伟大母亲身上那种朴实普通又光华夺目的民族表情,以小切口呈现了一个世纪的历史风云。这种小切口大格局的文学写作方式,体现了一种注重生命本身的现实主义文学特色,又找到了文学在新时代、新语境、新征程上重新出发的书写姿态。

书中的“母亲”是一位朴实且真实的农村女子,她的所有生命体验和表情都密切呼应着历史的行进步伐。比如其小时候的忍饥挨饿和在懵懂中与那位神秘女客人,也就是一名共产党员三天三夜的交流,随后她接受女客人的熏陶,树立要像她人做好人、做善事的朴实信念。女客人对母亲的重要影响,隐喻的恰恰就是中国共产党为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的使命担当。这部作品的题目也起得很精妙。“世纪母亲”,不仅说母亲生活了近一个世纪,更重要的是这位母亲的成长背景见证了中华民族一个世纪的革命历程。在这里,小我和民族、个体和国家、历史和现实有机地融合在一起。

初看起来,《世纪母亲》的结构艺术更多地秉承了民间写作的章回小说体例,它的结构是关于母亲生命的一种正叙叙事。这种结构方式的优点就是生动、简洁、明快,再加上母亲的成长背景是时代的流转和变迁,所以作品的可读性很强。然而细读后可以发现,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向传统传记小说或者传统章回体小说致敬的作品,文学内在线的代性和传统的实现较好的融合。比如,书中的历史事件和生活情景,虽然是在遵从时间顺序的叙述中展开,但对启迪引领母亲一生的那位神秘女客人形象的铺陈,采用的却是一种具有影像结构艺术特征的跳接手法。同时,现代性与传统性遥相呼应,不仅体现在对母亲主人公形象的塑造上,更体现在对没有姓名的女共产党员这样一个典型的配角描写上。这个女共产党员看似配角,却是引领母亲前行的精神主角,这种描述呈现出一种四两拨千斤的文学精妙。

一部好的文学作品真正要感动人,就必须拥有一个最大幅度的共情点。《世纪母亲》紧扣了人爱母亲、致敬母亲这一共情点,以一位母亲的形象折射反映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百年历史。这种描写,如果离开生动的细节描写,肯定就会流于标语口号。这个作品的可贵之处就在于真实鲜活的,不夸大、不美饰的细节。比如说母亲和她的丈夫谈心,要和小伙子分手,决定把祖屋留给小叔子,好让他娶妻子。她要让村里的乡亲们做个见证,自己只想要家中院子里那棵老槐树,因为它家是家族生存的一种念想……这些看似唠唠叨叨的细节描写,既鲜活生动又真实感人,流淌着日常生活的烟火气息。同时,母亲之所以一直唠叨世间有神灵,是因为当年那个女客人在她心中种下的善的信仰,这种善被她当作一种生命神祇而终生遵循。作品是通过充沛鲜活

的日常细节,将母亲的形象塑造得丰满立体。细节就是力量,这种对共情点的精准刻画,这种具有感染力的细节描写,充分展示了文学温润人心的质地。(作者系山东大学教授)

让文学人物接上生活的地气,洋溢时代的朝气

近年有一批青年作家重拾“写实主义”这门传统技艺,以平实的笔法、素朴的语调、感同身受的情怀,讲述普通人的生存处境。不过,相较于新时期初期人物形象高度概括性、典型的特征,大多青年作家仍然过度拘泥于日常生活叙述。人物命运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有些还触及现实的某些本质方面。但总体上,依然缺少一种更能揭示人类普遍处境的大悲悯和大醒悟。回望王蒙《夜的眼》里的陈果,那个在时代即将出现大转折之际,夜访北京的小人物。北京街上的羊肉串,勾起了他难以忘却的历史记忆;然而刚刚出现的现代生活气息,也在暗示他的离去,原来牵扯的却是无

法用语言来叙述的过去生活的风浪。与其说他逃离于街头,不如说他实际上逃离于劈头盖脸涌来的新生活,这是一个更为惊人的事实。作家永远都不能放弃“揭示生活深度”的职责,他对人生的犀利观察与揭露,他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辨别能力,在今天同样重要。举例来说,20世纪90年代初,面对滚滚而来的商业化浪潮,陈忠实却花了整整三年时间,在西安附近的长安、蓝田等地查阅地方志,在夜深人静时思索历史之谜、时代之谜。这种严肃面对历史和生活的创作态度,在今天依然是值得提倡的。他想知道的是:“春夏秋风秋雨冬雪里的原坡和河川,在我早已

司空见惯到毫不在意,现在在我眼里顿然鲜活起来生动起来,乃至陌生起来神秘起来。一个最直接的问题旋在我的心里,且不说太远,在我之前的两代或三代人,在这个原上以怎样的社会秩序生活着?他们和他们的子孙经历过怎样的生活变化中的喜悦和灾难?”与其他作家不同,陈忠实按照一个作家的独特理解,去重建他心目中的历史生活。于是,在他笔下便涌现出了白嘉轩、鹿兆鹏、鹿兆海、白灵等栩栩如生的小人物形象。某种意义上,与其说作家在刻画他的人物,不如说他是重建自己精神世界的基础上,来想象性地刻画这些人物。

不能用今昔之变,将文学的历

史分为两块,简单地认为“过去”的生活不能“重返”。今天人物塑造的低谷,恰恰可能是由于人为隔断了与过去历史的联系,没有将丰富的文学遗产作为一面反省创作的镜子来看待。针对当代青年作家创作存在的突出问题,特别是当前文学人物普遍存在的扁平化、平庸化现象,重提“小说还是要塑造人物形象”这个老生常谈的观点有特定的现实意义。塑造好的人物形象,还是要沉潜到生活深处,探寻现实人物身上蕴含的先进性与时代性,再通过艺术构思与审美锻造,让文学人物接上生活的地气,洋溢时代的朝气。(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

叙写勇于突围的扶贫故事——评长篇小说《琵琶围》

李洪华

中国特色脱贫攻坚事业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在这场惊天动地的脱贫攻坚战中,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和辉煌篇章,值得书写和关注。温燕霞的长篇小说《琵琶围》(江西人民出版社2020年12月出版),以强烈的时代使命感和鲜明的人道情怀,扎根现实大地,聚焦扶贫现场,以沉稳、坚实的现实主义笔触,及时在场地立体呈现了脱贫攻坚的壮美画卷,荣获“2020中国好书”可谓实至名归。

《琵琶围》的脱贫攻坚故事,不是以“规模”见长,而是以“深度”取胜。小说聚焦的是原中央苏区一个叫“琵琶围”的赣南乡村,叙写的是脱贫攻坚战中“攻克深度贫困堡垒”的最后阶段故事,并呈现历史和文化不同维度,真实生动地描写了这场前无古人的脱贫攻坚事业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小说中,省级扶持贫困村琵琶围孤悬深山,人多田少,资源匮乏,村民们生活极为困难,此前经过两年多的移民搬迁和精准扶贫,大多数住户已进行了易地搬迁,还剩十二户(其中九家贫困户)因各种原因仍滞留“围”中。有遭受自然灾害多次打击而“脑子里乱了麻糕”的酒鬼石浩财,有被没文化、缺钱和偏见“三根麻绳”拴住的朱雪飞、朱雨飞姐妹,有被穷困、多病和失子折磨得“心如

死灰”的石拐和许秀珍夫妇,有胆小被动、安贫认命的刘大有、赖秋香夫妇,还有遭受误解的五保户哑伯和丧失了劳动能力的红军亲属橘子婆等。

撼山易,撼人心难。《琵琶围》的重心不在叙述扶贫干部如何扶持贫困户进行物质生活上的脱贫,而在呈现他们如何融入乡村化解琵琶围人内心深处“的症结”。作者以《琵琶围》为题,显然有着深刻的象征寓意。作品从最初何劲华、金彩凤临危受命入“围”,通过因人施策、以心交心的细致耐心工作,到最终克服重重困难,实现旅游开发、产业脱贫和易地搬迁,帮助贫困户走出生活和心灵的“琵琶围”,这期间虽有荡气回肠的传奇,却处处充盈着见微知著的感动。既有何劲华、金彩凤等扶贫干部舍小家顾大局的无私奉献,也有哑伯、橘子婆等老红军亲属几十年如一日的烈士守墓、为路人施茶水的坚定执着;既有石浩财、朱雪飞等困难群众由顽固保守到积极主动的转型转变,也有赵峰、薛丁山等老知青重返故地回馈乡里的赤子情怀。正是因为党和政府的坚定决心、扶贫干部的久久为功和广大群众的众志成城,才有了新时代琵琶围人脱贫攻坚的壮丽画卷。

《琵琶围》的扶贫故事不但在历史的回溯中走向深入,而且还在文化风习的徜徉中走向丰盈。作为赣南客家人的后裔,温燕霞不但以沉稳的叙述,表达了对现实和传统的敬意,而且还以温情的笔墨,努力开拓乡土文化的叙述空间。在作者笔下,具有浓郁乡土色彩的客家歌谣、灯彩小调、方言俚语和民间习俗穿插在脱贫攻坚的叙述之中。这些独具魅力的客家风情,不但给坚实的扶贫故事带来了丰盈的诗意,而且拓展了叙述的空间。由此不难看出,温燕霞的《琵琶围》在坚实的生活大地、高远的历史天空和浓郁的文化风习中,立体呈现了脱贫攻坚的壮丽画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琵琶围》的脱贫攻坚叙写与一般意义上的扶贫故事拉开了距离,而成为当下这一时代主题书写中难得的佳作。

(作者系江西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南昌大学中文系教授)

让我们永远铭记——读非虚构作品《忘记我》

汪 政

徐风的《忘记我》(译林出版社2021年4月出版)是一部长篇幅非虚构作品,主人公钱秀玲籍贯江苏宜兴,出身名门,少年时求学苏州、上海,又随哥哥留学比利时鲁汶大学,先后获化学、物理学博士学位,后定居比利时,随丈夫行过医,在大学任过教,开过中餐馆,办过中文学校。这位晚年寂寞、曾经以居里夫人为自己人生楷模的女性于2008年在布鲁塞尔去世,享年96岁。这样的人生态度似乎平淡无奇,但钱秀玲女士却凭借着在二战期间的传奇表现而名垂青史。

她利用她的堂兄、当时的民国政府将军钱卓尔早年与民国政府军事顾问、后任二战时期比利时总督的德国法肯豪森将军的特殊关系,先后从德国国防军的枪口下解救了一个比利时人质,战后荣获比利时“国家英雄”的称号,人称“中国的辛德勒”。更为奇特的是,战后法肯豪森曾为任战时比利时总督曾作为比利时头号战犯押上了军事法庭,即将被判判处极刑,是钱秀玲又一次挺身而出,顶着各方压力,多方奔走,联络被救的人质,联名呼吁给这位救出许多比利时人的战士以公正的判决,最终获得成功。

在“国家英雄”的颁发仪式上,钱秀玲女士致辞时这样说:“当我有幸在占领国政府首脑面前为无辜的人质求情时,我意识到我是在为那些被最可怕的独裁者即将夺走的生命而抗争。”这位老人临终时说的一句话就是“忘记我”。这样的人应该被永远铭记,应该被反复书写。16年前,因为一次难得的机缘,徐风走近了钱秀玲女士,为家乡的这位杰出女性写一部书成了他的夙愿。16年来,徐风遍访钱家的后人、友朋,并赴比利时寻访被钱秀玲营救的人质或他们的后人,积累了大量第一手资料。现在,这部作品终于出版了。这是一部徐风献给英雄的书,是作者献给家乡的书,献给中国与世界的书。如果仅仅从文学的角度去讨论它,我觉得太轻了。世界上总是有这样的一些作家,是在为大地、为世界、为人类写作,也总有那样一些书,说它们是文学作品实在于狭隘。《忘记我》就是。钱秀玲女士嘱咐人们要忘记她,而我们恰恰要永远铭记她,铭记一切在战争中牺牲的人们,铭记那些为了和平、正义而奉献的人们。所以,如果一定要从文学的角度看《忘记我》,我更愿意将它看作是一部战争文学作品。不能因为那些直接描写战争场面的文学才是战争文学。

其实,在文学创作中,只要作品以战争为背景,只要人物的行动与战争有关,只要叙述的事件只有在战时才能发生,也只有战争才能给予解释,那它就是一部战争文学作品。从广义上说,处在某一具体的战争时空下,人们都是战争的参与者,他们可能是作战人员,但也可能是普通的平民。只有这样理解,我们才会更在更广阔的背景认识战争,才会对战争有更深刻的认识,也才会写出不同凡响的战争文学作品。

文学不是历史,不但要叙述事件,还要刻画人物,不但要交代事件的来龙去脉,更要思考事件背后的逻辑,不但要讲述故事,更要通过故事告诉人们更多的意义、价值与启示。所以,在徐风的笔下,一个边界清晰的事件在广阔的时空背景下被复杂地展现出来,以1943年为节点,叙述向时间的两端延展开去。时间的前端是从一座古桥的传说开始的,这座古桥承载的是中华美德,是勤劳、善良、是一个地方的朴素而古老的仁义文化。再接着是钱家的过去,是一个家族对耕读传家古训的坚守,也是一代代与时俱进,对新文化的接纳和对世界的敞开。

正是因为钱家,钱家兄弟才得以走出国门,在他们的心中有了世界,有了人类,而家国情也在他们的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因为年轻,所以钱秀玲才会对新事物充满向往,而本应在围中的女子因为少年的闯荡自有了不一样的侠义心肠与勇敢担当。传统、环境、时代以及自身的性格,成就了这些鲜明而富于个性的人物,更为他们的行事作出符合逻辑的解释。所以,作品既在写一段传奇的故事,更在刻画性格独特的人物,这种对人物文化与命运的展示,将无数的偶然变成必然,少一个环节都不行。《忘记我》没有正面战场的描写,但其紧张与惊心动魄不亚于一部通常的战争文学作品。我在其中读到了文化的作用、人性的内蕴、性格的魅力和命运的力量。记住这样的人与故事,就是记住文明的壮举。正如书籍的腰封上一句话所说的:“凡救一人,即救全世界。”这是钱秀玲的信念。秉持这样的信念,就会有善良、有正义、人类与世界就会有永续的和平。(作者系南京晓庄学院特聘教授)



正如小说《琵琶围》中所描写的,赣南乡村如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图为江西华屋村新景观。

新华社记者 胡晨欢摄